

# “李杜优劣论”再议

邓元煊

唐代是我国诗歌发展史上的黄金时代，而“李杜”雄踞于唐代诗坛，犹如“双子星座”，光芒万丈。这是客观存在，为举世所公认。但对“李杜”的评价，长期存在着很大分歧，尤其是二人孰优孰劣，众说纷纭，至今亦很难趋于一致。所谓“李杜优劣论”起于何时？为什么会产生“李杜优劣”之争？“李杜优劣”之争是否纯属无稽？如此等等，皆有“再议”之必要。本文就以上问题略抒浅见，以期从这场争论中总结出有益的经验教训，有利于今后对“李杜”的研究。

所谓“李杜优劣论”的起始，刘煦《旧唐书·杜甫传》云：“元和中，词人元稹论李、杜之优劣曰：‘予读诗至杜子美，而知小大之有所总萃焉。……盖所谓上薄风骚，下该沈宋，言夺苏李，气吞曹刘，掩颜谢之孤高，杂徐庾之流丽，尽得古今之体势，而兼人人之所独专矣。使仲尼考覈其旨要，尚不知贵其多乎哉！苟以为能所不能，无可无不可，则诗人已来未有如子美者。是时山东李白，亦以文奇取称，时人谓之李杜。予观其壮浪纵恣，摆去拘束，模写物象，及乐府歌诗，诚亦差肩于子美矣，至若铺陈终始，排比声韵，大或千言，次犹数百，词气豪迈，而风调清深，属对律切，而脱弃凡近，则李尚不能历其藩翰，况堂奥乎！……’自后属文者，以稹论为是。”书中引文见元稹《唐检校工部员外郎杜君墓志铭并序》。

元稹是否在“论李杜之优劣”，《旧唐书》的概括是否恰当，早有异议。由宋至今，因袭刘煦旧说，以元稹为始作俑者居多。如北宋魏泰《临汉隐居诗话》云：“元稹作李杜优劣论，先杜而后李……”。张戒《岁寒堂诗话》亦云：“元微之尝谓‘自诗人以来未有如子美者’，而复以太白为不及……”。南宋周紫芝《竹坡诗语》言之尤明：“元微之作李杜优劣论，谓太白不能窥杜甫之藩篱，况堂奥乎？唐人未尝有此论，而稹始为之。”至清，方世举《韩昌黎诗集编年笺注》道之更切：“元于元和八年作《杜工部墓志铭》云……，其尊杜贬李，亦已甚矣。”今人亦多从此说。有人也曾对此表示怀疑，认为所谓“论李杜之优劣”并非元稹本意。如方成珪《韩集笺正》云：“鲍以文云：此是《工部墓志》，非论也。愚按：微之《墓志》亦是文家借宾定主法耳，况并未谤伤供奉也。”今人吴庚舜同志《元稹对李杜的比较研究》对此详为论证，认为这是“刘煦等对史料鉴别不精而产生的一种误解，所以与其说元稹是‘李杜优劣论’的始作俑者，倒不如说是《旧唐书》的编者挑起了这场历时一千余年的争论”，并结论说：“李杜并称世有定论，优劣论者可以休矣！”（见《李白研究论丛》）吴文不乏新见，但窃以为尚有可再议之处。

元稹的文章不是专门“论李杜之优劣”，而将李杜作对照分析，“是文家借宾定主之常法”，方成珪从“墓志”的写作进行探讨，是颇有见地的。但元稹虽“未谤伤供奉”，在进行比较时“扬杜抑李”的倾向却是十分明显的。吴文对元稹的话作了具体分析，认为“首先，在总的方面，也就是在大前提方面，他承认李杜可以并称”，但同时也认为，“在承认李杜是唐首屈一指的两位诗人的大前提下，元稹确实说过李白不及杜甫之处：‘至若铺陈始终，排比声韵，大或千言，次或数百，词气豪迈，而风调清深，属对律切，而脱弃凡近，则李尚不能历其藩翰，况堂奥乎？’……在元稹看来，李白不如杜甫之处在排律，如果一般地说杜甫在诗歌的各体之中也擅长排律而李白不写排律，这并不错，因为这是一个事实。”既然如此，《旧唐书》也还不是信口雌黄，还不能武断地说“刘煦等对史料鉴别不精”。

的确，元稹少时在《代曲江老人百韵》中写下过“李杜诗篇敌，苏张笔力匀”的诗句，但从他在更多的诗文中所表述的观点来看，他推崇杜甫是远甚于李白的。在《酬孝甫见赠十首》中写道：“杜甫天才颇绝伦，每寻诗卷似情亲。怜渠直道当时语，不著心源傍古人。”既称其“绝伦”，又深感“情亲”，并尤怜其“直道当时语”，赞叹不已。在《乐府古题序》中提出“刺美见事”的主张，并说：“近代唯诗人杜甫《悲陈陶》、《哀江头》、《兵车》、《丽人》等，凡所歌行，率皆即事名篇，无复倚傍。余少时友人乐天、李公垂辈，谓是为当，遂不复拟赋古题。”在《叙诗寄乐天书》中还说：“得杜甫诗数百首，爱其浩荡津涯，处处臻到，始病沈之不存寄兴，而讶子昂之未暇旁备矣。”可见其对杜甫确乎推崇备至。元好问《论诗绝句》中有“少陵自有连城璧，争奈微之识砭砭”的讥评，但其自注云“事见元稹《子美墓志》”，明言仅针对“墓志”一文而言。综观元稹的整个看法，他对杜甫的“连城璧”并非视而不见，而是赞叹推崇，并孜孜以求的。

不仅元稹，元白诗派的另一代表白居易的诗论也明显地现出同样倾向。白居易也曾将“李杜”并举，在《读李杜诗集因题卷后》中写道：“翰林江左日，员外剑南时。不得高官职，仍逢苦乱离。暮年逋客恨，浮世谪仙悲。吟咏留千古，声名动四夷。文场供秀句，乐府待新辞。天意君须会，人间要好诗。”但从他的诗歌理论和创作实践的总体来看，与元稹的观点是一致的。在《唐衢(其二)》中写道：“惟有唐衢见，知我平生志。……致吾陈杜间，赏爱非常意。”以唐衢为知音，以其“致吾陈杜间”而自慰。《与元九书》是其诗论的系统性的总结，提出了“文章合为时而著，诗歌合为事而作”，“诗者，根情苗言，华声实义”等主张，并将“李杜”作了比较。文中写道：“唐兴二百年，其间诗人不可胜数。所可举者，陈子昂有《感遇》诗二十首，鲍参军有《感兴》诗十五首。又诗之豪者，世称李杜。李之作才亦奇矣，人不逮矣。索其风雅比兴，十无一焉。杜诗最多，可传者千余首，至于贯穿今古，窈窕格律，尽工尽善，又过于李，然撮其《新安吏》、《石壕吏》、《潼关吏》、《芦子》、《花门》之章，‘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之句，亦不过十三四。杜尚如此，况不逮杜者乎？”对这段话的理解也不一致。有人认为：“他并未贬抑李白，对李、杜的评价，与元稹有明显的差别。”（罗宗强：《李杜论略》）细读白居易原文，其对杜甫亦似有微词，但在李杜之比较中，其“扬杜抑李”与元稹别无二致。“至于贯穿今古，窈窕格律，尽工尽善，又过于李”，与元稹《子美墓志》意同。“文章合为时而著，诗歌合为事而作”与“刺美见事”，“风雅比兴”与“寄兴”，二人主张一致，对杜诗精华的看法也一致。“不过十三四”与“十无一焉”，两相对照，有所轩轾亦甚明显。

“元白诗派”之所以扬杜抑李，并非偶然，这与他们的诗歌理论和创作实践是直接相关的。元白的诗歌理论中有新的东西，为时于事而作的创作原则，“惟歌生民病”的创作方向，通俗平易的创作形式等，都无疑代表着一种进步的倾向。但是，他们又直接继承了儒家的诗乐理论，并把儒家的某些观点绝对化，因而表现出文学史观上的偏枯和保守。他们特别强调的是诗歌的教化作用和社会功能，认为诗歌必须负起“补察时政”、“泄导人情”的使命，从而达到“救济人病，裨补时阙”的政治目的。元稹说：“始尧舜时，君臣以庆歌相和。是后诗人继作，历夏、殷、周千余年，仲尼缉拾选练其干预教化之尤者三百，其余无闻焉。”（《杜君墓志铭并序》）白居易《读张籍古乐府》云：“为诗意为何？六义互铺陈。风雅比兴外，未尝著空文。”从“干预教化”这种狭隘的功利论出发，把“六义”“风雅比兴”作为评价诗歌的绝对标准，因而必然贬抑浪漫主义文学，将绝大多数诗人的诗篇都排斥在“诗道”之外。元稹说“骚人作而怨愤之态繁”（《杜君墓志铭并序》），白居易认为“泽畔之吟，归于怨思”，“义类不具”（《与元九书》），他们对屈原是有所贬抑的。扬杜抑李，说李白“风雅比兴，十无一焉”，也完全是从儒家的诗教着眼的。他们在创作实践中，则积极提倡杜甫“即事名篇，无复倚傍”的创作经验，大力实践新乐府的写作。元稹在《进诗状》中自己总结说：“九岁学诗，少经贫贱，十年谪宦，备极凄惶，凡所为文，多因感慨。虽无作者之风，粗中遭人之采。”白居易则写了大量的“讽谕诗”，即所谓“自拾遗来，凡所适、所感，关于美刺比兴者，又自武德迄元和，因事立题，题为新乐府者，共一百五十首”（《与元九书》）。元白之一再推许杜甫的排律，也是因为他们之间次韵相酬的长篇排律不少，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如元稹《白氏长庆集序》所云：“予始与乐天同校秘书之名，多以诗章相赠答。会予谴掾江陵，乐天犹在翰林，寄予百韵律诗及杂体前后数十章。是后各佐江、通，复相酬寄。巴、蜀、江、楚间，洎长安中少年，递相仿效，竞作新词，自谓为元和诗。”元白之写作长篇排律，似与其“诗教”相抵牾，但不足为怪。事物发展的辩证法就是这样，一种标准或一种理论被绝对化以后，这一标准的倡导者自己也不可能贯彻始终。当其不受“诗教”羁绊的时候，诗歌的内容和艺术都更多样化了。

扬杜抑李的倾向在中唐出现，也有其历史的必然性。安史乱后，统治阶级内部矛盾空前加剧，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日益尖锐化，这就迫使诗人们不能不正视现实。因而天宝以还，不少诗人从幻梦中惊醒，将目光从天上移向人间。到贞元、元和时代，一度出现了暂时的全国统一局面，又为诗人们改革现实带来一线希望，于是他们接过儒家的“诗教”作为理论武器，运用诗歌形式为力图改革弊政服务，把诗作为面谏、上书的有力补充，大量讽谕诗便应运而生。从诗歌创作的发展来看，“诗至杜子美一变”（苏轼语）。由杜甫首倡，继而元结、顾况又有所发展，然后由张籍、王建、李绅等人的创作开端，元稹扬其波，白居易集其成，于是形成了新乐府运动这样一个历史事实。张籍、王建的诗，并称为“张王乐府”。李绅有《新乐府二十篇》，元稹以为“雅有所谓，不虛为文”，遂“取其病时之尤急者，列而和之”，写成《和李校书新题乐府十二首》，并提出了创作理论。白居易在元稹的基础上扩充为五十首，名曰“新乐府”，并在序里进一步提出诗歌创作的主张，于是蔚为大观，在中唐独树一帜，与“韩孟诗派”双峰并峙，相互辉映。韩愈的《调张籍》是否直接针对元稹或元稹一派的，难以断定，尚待进一步研究。从魏泰《临汉隐居诗话》提出《调张籍》“为微之受”的观点后，不少人赞同。但也有人提出过异议。周紫芝表示怀疑：“微之虽不当自作优

劣，然指稹为愚儿，岂退之之意乎？”（《竹坡诗话》）方成珪则予以否定：“微之《墓志》亦是文家借宾定主常法耳，况并未谤伤供奉也。谓此诗为微之发，当不其然。”吴庚舜同志用大量篇幅进行论证，认为“说韩愈写《调张籍》是斥责元稹，或元白，或‘元稹一派’也是无稽之谈”（《元稹对李杜诗的比较研究》）。我认为，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韩愈写《调张籍》是有所为而发的，他对扬杜抑李的观点是持异议的，对“谤伤”李杜者是极为不满的。也正因为这样，“韩孟诗派”走着自己开辟的道路，形成了自己诗派独有的诗风和独具的个性。

自中唐以来，李杜优劣之争未尝稍息，一直延续至今。概而言之，存在着“扬杜抑李”、“扬李抑杜”和“李杜并重”三种不同的看法，而这三种看法又往往相互交错地存在于各个时代，在每个持论者身上的表露也呈现出不同情态。因此，探究这些不同看法产生的原因时，只能就具体时代、具体的人作具体分析，不能一概而论。如一般说来，宋代直接受杜甫的影响比较显著，“扬杜抑李”特别突出，王安石、苏辙可为代表。王安石编《四家诗》，置李白于杜甫、韩愈、欧阳修之后，并说“白识见污下，十首九说妇人与酒”（见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引惠洪《冷斋夜话》）。苏辙说：“李白诗类其为人，俊发豪放，华而不实，好事喜名，而不知义之所在也。”（《栟城集》卷八）但同时的欧阳修却更喜爱李白，在《笔谈》中说：“至于‘清风明月不用一钱买，玉山自倒非人推’……天才自放，非甫可到也。”认为“古今诗人众矣，而杜子美为首”（《王定国诗话叙》）的苏轼，却又写下过“谁知杜陵杰，名与谪仙高”（《次韵张安道读杜诗》）的诗句，严羽则又是鲜明的“李杜并重”派，认为“李杜二公，正当优劣”（《沧浪诗话》）。“扬杜抑李”和“扬李抑杜”这两种倾向在不同时代产生，在不同个人身上显露，原因也是多方面的，往往因时、因人而异。有的是由于时代风尚和社会环境的影响，有的是囿于个人的经历和遭遇，有的是因为各人的创作道路和审美情趣的差异，有的则出于某种政治偏见和理论偏见，等等。一段时期，片面强调文艺为政治服务，或用所谓阶级分析代替艺术分析，在对李杜的评价上造成很大混乱。“扬杜”者断言“抑杜”的都是反现实主义的，“扬李”者则认定“扬杜”是封建时代士大夫阶层的定论”，这些看法自然带有极大的片面性，是不足为训的。但是，在历史上延续了一千多年的这场“李杜优劣”之争，也并非纯属无稽。“李杜”并未湮没无闻，而有那么多人来问津，有那么多人来讨论，这本身就是一件盛事，显示了李杜诗歌的旺盛生命力和深远的、巨大的影响。还应看到，通过长期的争论，李杜的面貌愈加明晰，李杜在创作上的成就和价值也更加为人们所了解和认识，有力地推动了李杜研究，把李杜研究逐步引向深入。如果能对这场论争进一步作系统的总结，去其糟粕、取其精华，从中吸取有益的经验教训，对我们今天的李杜研究，也不是毫无裨益的。

在这场争论中，“李杜并重”的观点影响最大。自韩愈发出“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的千古绝唱以后，应者云集。其学生皇甫湜《题浯溪石》云：“李杜才海翻，高下非可概。”其后，杜牧说：“李杜泛浩浩，韩柳摩苍苍”。（《东日寄小侄阿宜诗》）李商隐说：“李杜操持事略齐，三才万象共端倪。”（《漫成》）北宋张戒就认为：“退之于李杜，但极口推尊，而未尝优劣，此乃公论也。”（《岁寒堂诗话》）即使是“扬杜抑李”或“扬李抑杜”者，大多也只是在比较中有所轩轾而已。首倡这场论争的元白，不是有时也“李杜”并称么？象某些宋人那样，断然地全盘否定另一方的，确乎不多。现代人大多赞同“李杜并重”

说，或称之为“双子座”，或称之为“孪生子”，认为二人各具特色，各有千秋，不能强为优劣，妄加抑扬。

但是，人们并不满足于这样的简单结论。早在南宋时，随着研究的深入，严羽在《沧浪诗话》中就曾发表过一段很深刻的见解。他说：“李白有一二妙处，子美不能道；子美有一二妙处，太白不能作。子美不能为太白之飘逸，太白不能为子美之沉郁。”现在看来，严羽这段话仍然是颇有见地的。每个人可以有自己的艺术爱好，这点不必强求一致。但对李杜的文学创作及其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应该有一个客观的分析和评价。二人的生活 and 时代、经历和思想，以及所走过的创作道路均有差异，因而诗歌的创作方法、体裁运用、语言艺术等方面都表现出各自不同的特点，他们都以各自独特的成就为我们古老的诗国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李白主要生活在安史之乱以前，长期漫游的生活体验，两入长安对现实的体察，以及安史之乱爆发后的短暂经历，都对他的思想和创作带来深远的影响。杜甫主要活动在安史之乱爆发前后，困守长安十年，漂泊西南十载，并亲历战乱的磨难，为他的创作打下了坚实的思想基础和生活基础。

李白出身于富裕家庭，一生处于理想与现实、追求与幻灭的矛盾之中，儒家思想对他有影响，但又更多地接受了道家思想和纵横家思想。杜甫出生在一个“奉儒守官，未坠故业”的封建家庭，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有着“立功立言”的强烈愿望。由于现实生活的磨炼和政治的影响，使他更多地接受了儒家思想的积极部分，并在一定程度上能突破儒家思想的局限。

人称“诗仙”的李白，他的诗歌是继屈原之后，我国积极浪漫主义发展的新高峰，为浪漫主义诗歌传统的发扬光大起了继往开来的作用。浪漫主义精神渗透于各种题材，理想主义、反抗精神和英雄性格在他的诗中得到全面的表现和进一步发展，其基调是进取的、积极的，具有不可阻遏的气魄和力量。人称“诗圣”的杜甫，则继承和发展了《诗经》与汉魏诗歌的传统，把现实主义诗歌推向新的高峰，在现实主义诗歌的发展过程中占有承前启后的重要地位。他的主要作品都贯穿着现实主义精神，始终面对现实，讽喻时事，热爱生活，忧国忧民，具体而真切地反映了唐代封建社会由极盛走向大衰这一历史转折过程中种种社会现象，因而被称为“诗史”。

李白主要运用浪漫主义的表现手法，他的诗富有强烈的主观感情色彩，通过形象的个性化，丰富奇特的想象以及最大胆的夸张，从大处着墨来渲染奇幻的理想境界和现实图景，曲折地反映盛唐时代的精神面貌和种种矛盾。杜甫则主要运用现实主义的表现手法，他的诗使主观情志和客观物象相统一，并以体物察情见长，善于对现实生活作高度的艺术概括，把雄浑壮阔的艺术境界和细致入微的艺术手法结合起来，及时地反映重大的政治事件和尖锐的社会矛盾。

李白诗体裁多样，但长于乐府歌行和五、七言绝句；杜甫则众体兼长，而尤以古体和律诗为佳。李白的语言清新自然、明净华美，豪放飘逸是其艺术风格的主要特征；杜甫诗的语言苍老遒劲、凝炼精工，其风格的主要特征是沉郁顿挫。

以上的概括自然是很不全面的，但足以说明，任何伟大作家都不能尽备众美，而是各有所长，“李杜文章”也是如此。大家对这些问题的看法也并不一致，许多问题都还有待于进

(下转第29页)

对这些吉光片羽似的零散见解从理论上加以系统化。在郑先生所引拙文中，已有钱谦益论杜甫昭揭肃宗“隐而未暴”之“逆状”，以及胡小石指出杜甫晚期思想的“极大质变”之说。郑先生批评拙文时有这样一段话：

（杜诗）如果到了反抗的程度，自然达到了许君所引胡先生所指的“极大质变”，也合于所谓“彻底抛弃‘平日所爱诸儒家之信条’及‘维系封建统治之纲常名教’，将其‘悉付粉碎虚空’”。从这段话不难看出，郑先生认为拙文与胡小石先生的观点是完全一致的。但是遗憾的是，郑先生在对拙文极尽批驳之时，通篇对其自己曾两度引用的胡小石之语乃至钱谦益之见却避而不置一词，这不能不令人感到莫大的困惑。而从这一事实本身，也自然不能不使人对郑先生的驳难之词的可靠性及可信性产生极大的疑问。郑先生在文章的结尾处又有云：

至于意存反抗的诗篇，在他（指杜甫）的晚年作品中尚未发现；尤其对暴政的揭露，还找不到如《兵车行》、前后《出塞》那样的诗篇。

这是为了说明杜甫晚年诗中没有“反抗暴政”之作，但客观上却又承认杜甫早期作品《兵车行》、前后《出塞》是“反抗暴政”之作。这又使其全文的立论基础出现了明显的矛盾。

其实，持反对杜诗“忠君”说观点的尚不止钱、胡二人，前引今人俞平伯之论也是极为明晰的。另外，治杜诗的人大约都知道清代杰出批评家金圣叹的《杜诗解》。金氏在批评杜诗中，敢于冲破“温柔敦厚”的诗教藩篱，从根本上反对把杜甫看作是“一饭不忘君”的腐儒，特别强调杜的批判精神、斗争锋芒以及深广的人民性，更是淋漓尽致。对于金氏的批解，此不赘引，且看其《长夏读杜诗》中云：

万里桥西宅，龙门寺后诗。冬春惟眼泪，玄肃最微辞。

这里，“冬春惟眼泪”，已写尽杜甫忧国忧民的一生；“玄肃最微辞”，则大胆肯定了杜甫讥刺乃至抨击最高统治者——君的勇气。而这也正可作杜甫的忧国忧民思想与刺君精神同时存在以及其忧国忧民思想与忠君思想必须分开的绝好注脚。对于这些重要的见解，郑先生讨论这一问题时怎么能全然忽略或竟不置一辞呢？

以上仅就郑先生之驳难，约略申明己见，难以尽意处，则请参阅前已举目之拙文。如此，未知能够起到帮助郑先生对前哲之论的回忆乃至释其疑窦的作用否？

---

（上接第76页）

一步研究，今后必然还会长期争论下去。有人也还并不满足于“并重”的提法，认为既是比较，在比较中进行鉴别，那就不仅存在着差异，在某些问题上还会有优劣之分。杨慎就说过：“今人谓李杜不可以优劣，此语亦太愤愤！”（《升庵外集》）我想，优劣之争也还并不会就此罢休，随着李杜研究的不断深入，这种争论也必然还会延伸。真理愈辩愈明，没有矛盾，没有争论，我们的研究工作就不可能有所前进。